

所到之處，寮人無不視為寇讎，何以中共駐防寮北的部隊並未造成此種惡感？殊不知寮人除憎恨越共軍的強迫征糧而外，另有寮人對越南傳統的怨恨，至于寮北居民，無論寮族或其他少數民族，都是來自雲南，對中國軍民，一向都親如一家，所以並無歧視。

中共經過十七年長期經營的寮北，無論是否因受越共及其寮國傀儡所迫而撤軍，但其在民間留下反越共的勢力，則屬勢所必然，至于由中共一手哺育而成的寮共部隊，亦勢必隨之撤回滇邊，并將組成特種突擊武裝，在寮北民衆地下反叛組織的裏應外合之下，繼續從事鬥爭，而使越共防軍更深陷于泥淖之中，蘇俄亦無法插手。由此可見寮國情勢的變化，對越、俄、中共在印支的全面角逐，具有重大的影響；且就目前情勢以觀越俄在此一角逐中，未必佔到了上風。

西南亞戰略形勢

沈鈞傳

一 西南亞洲的戰略地位

南亞亦稱南亞次大陸或印度次大陸，包括希瑪拉雅山以南、阿富汗以東地區的國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斯里蘭卡、尼泊爾和布丹等國。至於西亞則是指上述地區以外的「中東」和「近東」的亞洲國家而言，其範圍則由愛琴海到印度洋，從都蘭平原（Plain of Turan）到亞丁灣（Gulf of Aden），包括下列十六個主要國家：伊朗、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敘利亞、黎巴嫩、以色列、約旦、北葉門、南葉門、巴林、卡達、阿曼、塞普勒斯、科威特和阿拉伯酋長國聯邦等。

由於戰略地位重要，西南亞地區自古便成爲兵家必爭之地。尤其自帝俄以迄蘇聯，一直想從亞洲大陸經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插足波斯灣和印度洋，同時也希望從黑海出達達尼爾和博斯普魯斯兩海峽以控制地中海，進而出直布羅陀海峽到大西洋。因此，自十八世紀以來，俄國就在西南亞地區和英國發生直接衝突。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南亞已成爲美國圍堵共產主義擴張的全球防線之中央地帶。最近，印度洋和地中海更是美蘇爭奪海洋控制的焦點。

就海權的控制而言，印度洋確爲當今的戰略海域，尤其最近蘇聯在紅海地區兩岸的戰略要衝——南葉門和非洲之角——的勢力，大爲擴張，阿拉伯半島南端的南葉門與蘇聯已簽訂「防衛條約」，隨着五艘俄艦駛入亞丁港，控制紅海南端出口的曼德海峽顯然

已落入蘇聯之手，①從地中海通往印度洋的航運安全面臨了新的威脅。今年四月底阿富汗政變後，其新政權採親蘇聯政策，據傳阿富汗將與蘇聯簽訂一項「友好條約」，包括雙方「安全」條款，②如果這一發展屬實，那麼蘇聯自一九七一年與印度簽訂「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後，在南亞再度獲得一項重要的成就，不僅影響到伊朗和巴基斯坦，而且可能使整個西南亞的戰略形勢為之改觀，因為阿富汗政變之後，巴基斯坦的安全受到來自印、阿的兩面威脅，如果西方國家不能改進與巴基斯坦關係，那麼西方賴以圍堵共產主義的中央公約組織，便可能解體。

就全球戰略而言，今天蘇聯的目標，一方面在包圍中共，另一方面則和美國爭奪歐西大陸的邊緣地帶，最後則希望把美國逐出歐亞大陸。西南亞位居世界島邊緣地帶的中央，而且又為歐亞航線的必經之地，長久以來一直是大國爭奪的目標。自一九七四年以來，蘇聯插足非洲之角，企圖控制索馬利亞，其染指紅海的野心已暴露無遺。阿富汗政變後，蘇聯實際上已控制了波斯灣的入口。今年六月底南葉門軍變後，蘇聯在西南亞的勢力已急速膨脹，如果從紅海經亞丁灣到波斯灣一帶發生戰爭，蘇聯將可立即切斷東西的海上運輸，日本和其他西方國家之石油供應將中斷。因此，今天西方國家鑑於這一威脅，已開始力圖加強西亞各國的關係。一個由沙烏地阿拉伯、伊朗、伊拉克和波斯灣其他產油小國的聯防體系正在醞釀之中。為了穩定南亞局勢，美國國務院已於八月廿日宣稱，希望恢復對巴基斯坦的經援計劃，③八月底傳聞美國將向巴國提供五中隊F-5E戰鬥機及一百架A-1J型戰鬥轟炸機，這是美國自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拒絕出售軍機以來，首次決定向巴國提供軍經援助，④其目的在使巴國繼續在對抗蘇聯擴張時，擔任積極的角色，不致於脫離中央公約的陣營。接着卡特總統於九月廿六日正式宣佈解除對土耳其的軍火禁運，其意義顯然在加強北約的南翼和中央公約的西翼，以便制衡蘇聯在歐洲以迄西南亞的軍事部署和擴張行徑。

二 巴基斯坦與東南亞公約組織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在全球不斷地擴張，所以西歐國家在美國領導下，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作為在歐洲圍堵共產主義擴張的區域性安全體制。一九四九年四月北約在華盛頓成立後，希臘和土耳其於一九五二年簽字加入，使北約圍堵的範圍擴及歐亞鄰接地區。一九四九年中共竊據大陸後，東南亞地區的自由國家所受威脅日增，自應團結抗共，但是這地區的國家大部份於戰後始

註① 香港「大公報」，一九七八年七月九日。

註②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八年八月三日。

註③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August 26, 1978.

註④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August 31, 1978.

告獨立，內部問題急待解決，各項建設百廢待舉，政治態度正不知何去何從。一九五〇年韓戰發生，美國有感於亞洲情勢日趨嚴重，衆議院外交委員會全體一致通過一項提案，要求美國政府，仿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一個太平洋公約組織。翌年，美國與澳、紐、菲、日簽訂共同防禦條約，接著於一九五三年與韓國，五四年與中華民國簽訂類似的條約，但是這些條約只是雙邊的安全協防性質，並沒有形成亞洲集體安全的多邊區域安全組織。一直到一九五四年越南情勢惡化，日內瓦停戰協定之後，亞洲的自由國家更感到共黨集團壓力嚴重，乃於是年九月八日在馬尼拉簽訂了東南亞集體防禦條約及太平洋憲章，參加的國家有美、英、法、澳、紐、泰、菲、巴等八國，待各國完成批准手續後，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九日正式生效，一九五六年東南亞公約組織乃於曼谷正式成立。

東約的最初構想，是在藉各有關國家的聯防，以對抗蘇聯與中共對此一地區的侵略和滲透。可是印度之不願參加東約，致使南亞地區留下了一個圍堵的重大缺口；再加上英法兩國自始就對於以美國為主體的東約組織並不熱心，甚至於可以說是扯後腿，所以東約可以說是個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區域性安排。

東南亞公約成立之前，美國原希望印度和巴基斯坦能成爲圍堵中共的兩根柱石，可是印度既不願捲入美蘇冷戰的漩渦，又不敢得罪鄰近的中共，所以在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後，印度總理尼赫魯、南斯拉夫總統狄托、印尼總統蘇卡諾、埃及總統納塞、錫蘭總理班達奈克夫人等領導組成不結盟集團。印度當時希望成爲不結盟國家的領導人，在美蘇兩大集團之外，建立一個第三勢力，俾在美蘇之間左右逢源，一方面可以接受來自美蘇兩國的援助，另一方面則利用不結盟關係，和中共在亞非國家間無論在政治、經濟和對外貿易等方面競爭領導地位。所以印度的採取不結盟政策，正表示拒絕了加入東南亞公約組織的決心，使得整個東約的西翼形成一大缺口，當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就曾指責不結盟政策是個不道德、是個罪惡的選擇。

印度不參加東南亞公約組織，巴基斯坦乃成爲美國圍堵共產世界在南亞滲透的唯一柱石，可是巴國加入東約是別具用心的。它的主要目標只是在利用東約，爭取美國的軍事援助，以對抗印度，尤其是印巴分治以後，巴基斯坦最大的戰略目標就是取得克什米爾的統治權。至於圍堵共產主義的擴張只是策略運用而已。周恩來在一九六三年向巴基斯坦記者透露，早在一九五四年，巴國領袖已向他保證，巴基斯坦與美國的結盟，僅希望在政治和軍事上壓倒印度，別無其他動機可言。由此可見，巴國加入東約的動機並不純正，所以在一九六二年中共與印度發生邊界衝突後，巴基斯坦採取了「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政策，開始和中共進行勾搭，自此以後，中共與巴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關係日益增強，一直到現到，始終保持着密切的友好關係。巴基斯坦一方面是東約的會員國，另一方面又與中共密切勾結，對美國的圍堵政策而言，無疑是個莫大的諷刺。

法國雖然是東約的會員國，但是自從法國退出北大西洋公約軍事組織後，對東南亞公約組織的態度更爲冷淡，而且法國可以說從一九六七年起就不再參加任何東約的年會和軍事演習，因此法國之成爲東約的一員，早已名實不符。巴基斯坦早期表面上還維持與東約相當密切的聯繫，可是等到尼克森訪問北平後，東約顯然已失去存在的價值。這時巴國和中共的關係至爲親密。巴國爲了表

示對中共友好，也爲了報復美國久久未能解除對巴的「武器禁運」，所以在一九七二年底的東約年會中，竟然也告缺席。同年七月中旬，巴基斯坦總理布托，在國會告反對黨領袖稱，巴基斯坦將退出東約組織；至同年十一月八日，巴國果然正式宣佈退出。此後，英國亦貌合神離，澳洲和紐西蘭雖同意暫不退出，但主張放棄聯防。所餘下的泰國和菲律賓，由於軍事聯防爲其安危所繫，且其國內都有美軍駐防，故與華府尚能站在同一立場。至一九七五年初，美國政府受國會的限制，眼睜睜地看着越、高、寮淪陷而不假以援手，使泰菲兩國對華府之能否履行東約義務，已完全失去信心，所以在七月的泰菲高峯會議上決定，向東約理事會建議逐步解散「東約組織」，至一九七七年六月底，東南亞公約組織正式結束。

三 維繫西亞安全的中央公約組織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蘇聯全力向外擴張。「中東」及「近東」地區因地跨歐、亞、非三洲，戰略地位極爲重要，且盛產石油，乃成爲其垂涎的目標。自土耳其帝國式微後，整個西亞缺乏穩定重心，原在本地區最具影響力的英國，在戰爭結束之後亦感力不從心。於是戰後英美於一九四五年三月支持阿拉伯國家組成「阿拉伯國家聯盟」(League of Arab States)原欲使其成爲西部亞洲的一個新的穩定力量。無奈阿拉伯國家因殖民時期對西方之反感記憶猶新，心懷猜忌，認爲威脅西亞各國國家安全與發展者，西方帝國主義尤甚於蘇聯；再加上英美支持猶太復國運動，促使聯合國大會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廿九日，通過巴勒斯坦分治決議案。根據這一決議，以色列終於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正式成立，使所有阿拉伯國家深感痛恨與不安，在此新仇舊恨相互激盪之下，阿拉伯聯盟各國自然很難和西方國家和衷共濟。因此當美、英、法、土四國於一九五一年底，試圖建立一個以埃及爲中心的中東指揮所，以抵禦蘇聯南侵的構想時，終因埃及的從中作梗，使這一計劃終告落空。

一九五三年以後，美國鑒於事實上的困難，轉而採取迂迴的策略，用雙邊軍事同盟的方式，逐步把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和伊朗結合起來。接着，英美於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促使土耳其與伊拉克在巴格達簽訂土伊同盟條約，並號召其他阿拉伯國家參加。同年四月與伊拉克有同盟關係的英國宣佈參加；九月和土耳其有軍經合作協定的巴基斯坦亦宣佈加入；十一月伊朗也正式加盟，於是一個中東地區的防衛體系——巴格達公約組織——正式誕生。美國雖未正式參加，但已成爲該組織的經濟、「反顛覆」和軍事委員會的正式成員，且擔任該組織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實際上已居領導地位。

巴格達公約組織成立以後，蘇聯爲了抵制中東國家的防衛體系，乃積極拉攏埃及，分化中東國家和西方的關係，所以有蘇彝士大運河和埃敘合併兩事件發生，接着在蘇聯和埃及的導演下，促成了一九五八年的伊拉克政變。此後，伊拉克退出巴格達公約組織，而使該組織解體。但是中近東地區所受共黨集團的壓力却與日俱增，爲建立該地區之集體防禦，英國、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伊朗四

國，於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九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哥拉集會，根據巴格達公約組織的內容和美國與土、巴、伊朗三國所簽訂之雙邊協定作為基礎，重行改組稱為中央公約組織（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CENTO），并于一九六〇年元月一日，將中央公約組織總部由巴格達遷往安哥拉。

中央公約組織乃以建立西亞地區之軍事防禦為目的，因此其活動亦以軍事活動為主，在陸上旨在圍堵蘇聯向南亞及西亞擴張，在海上則在確保波斯灣和亞丁灣以迄地中海的安全。美國雖非中約的會員國，但却充分給與合作，且參加其軍事委員會，惟僅以觀察員身份列席中約理事會。

中約由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英國所組成，在西部亞洲成為美國全球圍堵政策的中央環節，東以巴基斯坦和東南亞公約組織相連，西以土耳其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相接，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佔有決定性的地位。

中約自成立以來，在經濟開發方面，確實收到顯著的成效，但其集體防禦的功能，並不令人滿意，尤其是巴基斯坦與印度在一九六五和一九七一年兩次戰爭，根本沒有使巴基斯坦的安全獲得保障。就一九七一年印巴戰爭而言，蘇聯全力支持印度，使巴基斯坦東西兩翼分裂為二，美國海軍雖然派有特遣隊進入孟加拉灣，但是並沒有挽回巴基斯坦慘遭肢解的命運，顯示出美巴的雙邊軍事協定和中約的集體防禦措施，形同虛設。一九七三年巴國外長阿默德（Aziz Ahmad）曾在德黑蘭召開的第廿屆中約部長級理事會議上，對這一組織大表不滿。布托總理在一九七二年七月即已表示，如果中約的其他三國——英、伊、土——在今後如不能履行對巴國的義務時，巴國將不惜退出中央公約組織。

今年四月底，阿富汗發生政變，新政府採取親蘇政策，巴基斯坦今後將處在印度和阿富汗的夾縫之中，伊朗也將受到親俄鄰國的威脅，尤其是巴基斯坦和伊朗與阿富汗邊境都有少數民族分離運動，要求獨立或併入阿富汗。因此，阿富汗左傾、伊、巴兩國首先受到威脅。巴基斯坦外長於五月九日訪問德黑蘭時，曾批評中央公約並沒有成爲一個有意義的組織；伊朗在五月底曾要求印度，一旦阿富汗形成威脅時，支持其所提的成立「伊巴聯盟」的建議，可是印度外長瓦吉巴伊並未表示同意。所以阿富汗政變，已使南亞和西亞的戰略形勢發生很大的變化。

最近巴基斯坦正重新考慮其外交政策。巴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阿克洪（Iqbal Akhund）曾向印度外長表示，巴基斯坦政府希望參加七月份在伯爾格萊德所舉行的不結盟國家部長會議。今年五月二十日，巴國外交顧問沙希（Agha Shahi）告倫敦泰晤士報稱，巴國因中央公約未能滿足其安全需要而考慮重估其對不結盟的立場，他并指責東約遇到蘇聯的壓力時，毫無還手的餘地；他認為如果中約不能阻止蘇聯的壓力，那麼巴國可能退出中約。接着巴基斯坦向美國要求大量的軍事援助，其中包括若干中隊的A-17長程戰鬥轟炸機，以便應付印度與阿富汗的「兩面作戰」。從這一事實看，如果美國在最近無法滿足巴國的安全需要，巴國很可能退出中約，伊朗也勢必隨之而發生動搖，那麼中央公約也將和東南亞公約組織一樣，遭受解體的命運。美國爲了安撫巴基斯坦，已於

今年八月起開始對巴繼續提供軍經援助，對土耳其的軍火禁運亦於九月解除，中央公約組織的東西兩翼已漸告穩定，美國如能進一步促成波斯灣產油國的合作與聯防，那麼在自由世界包圍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的中央，當不致因阿富汗和南葉門的左傾，而陷於戰略上的崩潰局面。

四 蘇聯對西南亞的戰略野心

從帝俄一直到蘇俄，這個橫跨歐亞兩洲的國家，其對南亞和西亞的企圖有三：

(一)從陸路經阿富汗·伊朗出波斯灣到印度洋，以求得一個在印度洋的出海口和海軍基地。

(二)由黑海出達達尼爾及博斯普魯士兩海峽到地中海，進而控制地中海，再從直布羅陀海峽出大西洋。

(三)掌握並控制蘇彝士運河，出紅海到印度洋。如此則歐亞非三洲的交通孔道和戰略資源全在掌握之中。^⑤

俄國這一野心在戰前受到英法的掣肘，戰後又受到美國全球圍堵政策的阻擋。始終未能得逞。古巴危機後，黑魯雪夫才覺悟到發展海軍，控制海洋是稱霸全球的必要途徑。十年以後，蘇聯已經建立了一支擁有現代化攻擊能力的海上艦隊，目前蘇聯海軍的攻勢戰略，不祇使潛艇裝載的核子飛彈，能攻擊美國的城市，而且在戰爭一旦爆發時，能立即切斷北美洲與歐洲和亞洲的交通線。

蘇聯在西亞和南亞的戰略，是全球戰略的一部份，其目的在包圍中共，並企圖將美國勢力逐出西南亞洲，其具體的行動，除發展太平洋和印度洋海軍，並尋求海軍基地外，自一九六九年以來，採取了下列多邊或雙邊的攻勢，企圖來孤立美國並包圍中共：

(一)一九六九年初，柯錫金建議，由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蘇聯，建立一個區域性的合作計劃，但是由於中共與巴基斯坦關係特殊，巴國無意落入蘇聯所設的反中共圈套之中而加以嚴詞拒絕。

(二)一九六九年六月，布里茲涅夫主張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擴大對中共的包圍，可惜亞洲國家中除了偽蒙以外，很少有公開表示支持的國家。蘇聯在到處碰壁之後，開始與個別國家建立雙邊性的同盟關係。

(三)當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華府與北平同時宣佈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之後，蘇聯立即於八月九日和印度簽訂「友好和平合作條約」，一方面加緊控制印度，另一方面則在打擊中和美國。其最終目的則在希望以印蘇條約為基礎，擴大對其他亞洲國家的關係。

(四)一九七一年五月廿七日，蘇埃兩國簽訂「友好合作」條約，其目的在防止美國與埃及恢復友好關係，並控制蘇彝士運河這一

註⑤ 喬治·冷佐斯基著，王兆荃譯，世界局勢中之中東（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九年）第三十一頁。

國際海道，可是這一條約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中旬爲沙達特總統所斷然廢棄，從此埃及重回西方陣營，對維持中東和平，具有決定性的貢獻。

(四)阿富汗於今年四月廿七日發生軍事政變，新總統塔拉基採取親蘇政策。俄國在沙皇時代就與阿富汗保持着密切的關係，今天蘇聯利用塔拉基政權，全面控制阿富汗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政策和措施，雙方在短短兩個月中，已簽訂了二十餘個協定，其中包括軍事協定在內，蘇聯已在阿國紮根，其從陸上到達印度洋之夢想，亦已向前推進了一步。

(五)南葉門於七月廿六日發生軍事叛亂，蘇聯勢力已深入紅海，其海軍也進駐亞丁港。南葉門位於阿拉伯半島南端，南臨亞丁灣和阿拉伯海，隔亞丁灣與烽火四起的非洲之角遙遙相望。這一地區不僅是歐亞非三洲的交通要衝，而其中的亞丁港也是扼紅海通印度洋的門戶，蘇聯控制南葉門後，對西亞兩大產油國——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將構成直接的威脅。

從最近南亞和西亞以及非洲之角等一系列的發展來看，蘇聯無論在海權的擴張和對戰略據點的爭奪，都掌握優勢。因此，美國今後爲了確保西南亞的安全，必先維持中央公約的存在，援助巴基斯坦、穩定伊朗、徹底解除對土耳其的武器禁運，使土、伊、巴三國結成一個經濟和軍事聯盟，以阻止蘇聯由阿富汗向印度洋北部的擴張。其次美國應支持一個由伊朗於今年二月初訪問印度時所提的亞洲共同市場的構想，設法把伊朗、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和尼泊爾等國團結起來，組織一個以經濟開發和技術合作的經濟體系，以對抗蘇聯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⑥最後美國應力促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聯合最近有意擺脫蘇聯影響的伊拉克，再加上北葉門、阿曼、巴林和阿拉伯酋長國，甚至於還可以拉攏北非之角的索馬利亞等國，建立一個波斯灣和紅海國家的聯防體系，以抵禦蘇聯在這一戰略要地的影響。不過這一地區各國間矛盾重重，對美國又都缺乏信賴，尤其美國支持以色列，更使阿拉伯國家懷恨在心，因此，這一地區的軍事和經濟合作，實有賴於沙烏地阿拉伯及伊朗兩個大國的有力推動。

五 中共企圖突破蘇聯的圍堵

自從蘇聯和中共交惡以後。蘇聯的全球戰略，除了孤立美國以外，就是包圍中共，迫使中共永遠屈居劣勢。爲了達到包圍中共的戰略，蘇聯首先在中蘇邊境集結大量兵力，引起了一九六九年的珍寶島軍事衝突；接着蘇聯海軍向亞洲海域和印度洋擴張，其目的之一乃在阻止中共對第三世界的活動。最後蘇聯和印度於一九七一年簽訂友好條約，使中共在戰略上遭受南北夾擊的困境。在外交策略方面，蘇聯也積極地着手包圍中共，其所鼓吹的「亞安體系」，雖然莫斯科方面一再否認這一倡議是針對任何一個國家，但

中共早已瞭解，「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主要目的在包圍中國大陸。自從中共與越共關係惡化後，蘇聯一方面支持越共在內製造華僑問題和加強邊境軍事活動；對外唆使越南「總理」范文同訪問東協五國，首先企圖抵制中共拉攏東協國家在亞洲組織「反霸同盟」，進而企圖把東協五國所主張的「和平自由中立區」的構想，逐漸轉化為「亞安體系」的一部份，對中共進行全面的包圍。

中共爲了突破蘇聯的包圍戰略，首先採取了聯美制俄的策略。到了十大以後，中共終於改變了過去三反戰略（反美、蘇、及各國反動派），創立了新的全球戰略理論，那就是所謂的「三個世界論」。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上的發言，⑦乃是第一次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地方，公開宣揚其全球戰略理論。根據這一理論，中共將世界權力結構分爲三類，美蘇爲「第一世界」；開發中國家爲「第三世界」；介於兩者之間的已開發國家爲「第二世界」，其中包括西歐、日本、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和部份東歐共產國家。中共的戰略任務，就是團結「第三世界」，拉攏「第二世界」，打擊「第一世界」；而在打擊「第一世界」過程中，又把蘇聯作爲頭號敵人，當作首要的打擊目標，因此在策略上仍然採「聯美制俄」的方式，來對抗所謂的共同敵人。

在此種戰略理論指導下，中共企圖組織一個反蘇的國際統一陣線。它首先拉攏西歐各國，希望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來牽制蘇聯的歐洲部份，以便減少中蘇邊界的軍事壓力；接着華國鋒訪問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離開蘇聯與東歐集團的關係。中共最近和日本簽訂所謂的「和平友好條約」，將「反霸條款」列入約文，從而將日本納入其反蘇陣線；再加上華國鋒曾於今年五月親訪北韓，試圖離間平壤與莫斯科間的關係。從中共對日本和北韓的積極活動來看，今後東北亞局勢將更形複雜。

對於東南亞和西南亞地區，中共也採主動的外交攻勢。最近一年來，中共頭目紛紛出國訪問，就東南亞和南亞地區而言，今年一、二月間鄧小平訪緬甸和尼泊爾；二月鄧穎超訪問高棉；三月李先念訪菲律賓和孟加拉，中共「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王炳南訪問印度；六月「國務院副總理」耿飴訪問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尤其是耿飴訪巴期間，曾於六月十八日參加了中共與巴國聯合建築的喀喇崑崙公路的通車典禮。⑧這條公路乃是從中國新疆省克什米爾經過巴屬克什米爾到達巴國首都伊斯蘭馬巴德的一條戰略公路，與新疆和西藏的公路網相啣接。中共可以經由這條公路直達印度洋的克拉崑崙港，其戰略意義遠大於經濟意義。今後中共一方面可利用這條公路向巴國提供軍事物資，另一方面可經由巴國首都向西南亞各國進行行政和經濟活動。這條公路通車後，蘇聯和印度都對中共大加指責，其重要性由此可見。

中共與日本簽訂「和平友好條約」後，中共突破蘇聯包圍的下一個主要對象就是印度。自從一九七六年中期中共和印度交換大使以來，雙方關係，侷限於文化、交通和貿易等方面，最近由於中蘇共關係的急遽惡化，中共和越共的分裂，中越邊界的緊張，中共急

註⑦ 「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一日。

註⑧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une 19, 1978.

謀與印度達成進一步的關係，俾扭轉南北夾擊的戰略劣勢。王炳南訪印期間，曾邀請印度外長訪問北平，並表示中共願意和印度談判邊界問題。⑨ 印度外長決定於今年十一月初應邀往訪，但是為了避免引起蘇聯的猜忌，瓦吉巴伊外長已於九月中旬先行訪問莫斯科，向蘇聯領袖保證「印度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絕不犧牲像蘇聯這樣的『可靠朋友』」。⑩ 在印度外長未來訪問北平期間，雙方勢必談到邊界問題，屆時中共爲了促進和印度的關係，緩和來自希瑪拉雅山以北的威脅，極可能在邊界問題上向印度有所讓步。但是印度總理和外長會一再表示，中共在一九六二年戰爭中所佔領的所有領土，包括新疆與印度相接的戰略地帶——阿克賽欽在內，必須歸還印度。這一點在中共而言，似不可能同意。因此，印度外長訪問中共時，對於邊界問題，不可能獲得根本解決，但可能設立一個邊界委員會，由雙方再從事冗長的會談。

阿富汗政變和南葉門出現親蘇政權前後，中共已在西亞地區全面展開攻勢外交，其中包括「外長」黃華於參加第十屆聯大特別會議後，在六月中旬訪問土耳其和伊朗；「人大副委員長」姬鵬飛於七月初訪敘利亞；「副外長」何英於六月底訪科威特和約旦，八月底華國鋒又親自訪問伊朗，試圖加強中共與南亞和波斯灣產油國間的關係。

從一年來中共對第二世界歐洲國家的爭取和對第三世界各國的拉攏，我們可以發現中共特別重視爭取不結盟國家。在南亞，中共除盡力鞏固和巴基斯坦的傳統友好關係外，並設法重建和印度的睦誼，希望一旦中蘇共發生軍事衝突時，印度能保持中立的立場；在西亞則重視伊朗和其他波斯灣產油國，企圖以伊朗爲中心，來對抗蘇聯在西南亞的勢力擴張。黃華在六月十七日訪德黑蘭時特別表示：「第三世界，包括中國（中共），必須和西方國家團結一致應付蘇聯的侵略」。⑪ 伊朗的政要在黃華訪問之後預測，「亞洲兩根支柱」的中（共）和伊朗，將在「受威脅地區」中協助亞洲反霸國家的重新組合。最近華國鋒訪伊時和巴拉維國王的會談中，也特別注重超級大國在波斯灣和印度洋的爭奪。⑫

我們可以預測，美國爲了保持西南亞邊緣戰略地帶的安全，爲了防止波斯灣石油落入蘇聯之手，很可能組織一個以波斯灣爲中心，并以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爲支柱的「波斯灣聯防體系」，以對抗蘇聯在這一地區的侵略和擴張。蘇聯也可能組織一個包括印度、阿富汗、南葉門和北非衣索比亞等國的軸心，以便和美國與中共相抗衡。

註⑨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March, 12, 1978.

註⑩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Sept. 15, 1978.

註⑪ 香港「大公報」，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八日。

註⑫ 香港「大公報」，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